

印度人眼中的中国形象

——亲历的触动与战略的构建*

张嘉妹

摘 要：印度从后殖民进入到独立的现代主权国家，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上，并未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如此前提下，在社会动员中调动属民的国民身份认同感时，其国家、政府和民众间的共同理念、认知等需要逐一建构。在此情况下，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大众传媒领域，对“假想敌”的树立与描述，有力且奏效。进入21世纪后，中国与印度在多数情况下，主动或被动地将彼此作为比较与竞争的对象，但从文化与历史观察上对彼此的了解，却难以与之相匹配。由此，本文以曾亲历中国的印度记者之记录为依托，探讨中印两国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镜像关系，以及不同处境中的情感联系。

关键词：印度 中国 国家形象 战略构建

引 言

在英文中，形象（image）一词与想象（imagination）同源，是人作为主体依据自己的直接或间接经验，对客体对象形成的认知。在“印度人眼中的中国形象”这一主题的探讨中，笔者作为观察探讨者，主要基于文学、文献等文本资料，探讨不同历史语境中印度人对中国人群体形象的代表性认知。而这里的群像，必是通过对个体形象和事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重大项目《中国与南亚的文学与文化交流研究》（批准号16JJD 750002）的成果之一。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

件的分析、归纳、总结，勾勒出的共通性特征。而主体接触到的具体的个体形象和事件，应该是随机又细致的，无论是在生活中的直接接触还是在书面中的间接接触，都引发了自身的感受，并在感受中提炼出理性的思考，形成具有代表性的认知。

在此文中，笔者主要以独立翻译完成的印度作家柯拉卡（Kalaka）的作品《重庆日记》为例证，辅以其他在中国生活过的印度人（主要是学者和记者）对中国的记录，通过镜像作用，初步探讨一下呈现在印度人眼中的“中国形象”。这一研究过程，实质上是将主体方面流传下来的对客体的记录与描述，由客体中的一员——研究者，再次将这些记录与描述分析提炼的一个过程。在此研究过程中，研究方作为文本中记录描述的广义群体中的一员，兼具主客体双重性，通过分析文献中的描写与记录，反思、再认识自身所处群体。以期通过此类研究深化自我群体认知，探讨不同文化群体的异同，主动寻找更有效、友好的共生及交流方式。

一、民族国家建立初期的镜像关系

20世纪前后，社会达尔文主义引导人们从肤色上判断人种的优劣。日本、中国和印度等主要亚洲国家的“黄色人种”被视为羸弱的东方人。西方人用酒和鸦片、刺刀和圣经来“征服”遥远的东方国家。义和团运动的终结，八国联军的入侵，大清帝国的坍塌，世人担忧中国将步印度后尘，彻底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成为亚洲古老文明全面覆灭的标志。彼时亚洲民众忧心忡忡，未来难料。身为被殖民者，印度士兵被英印帝国派到中国，参与八国联军的强掳行动。这让已经被全面殖民的印度人，一边佩服中国人的反抗精神，一边担心中国人的遭遇即是全体亚洲人的命运，内心无比矛盾。但是，这种参与侵略又同病相怜的境遇，终究还是鼓舞了无所适从的印度人，增强了他们反抗的信心。

1940年前后，日本侵华。当日本在亚洲内部实施军事扩张，行径

之恶劣令世人悚然之时，产生于20世纪初期、旨在反对西方列强的泛亚洲主义，终于分崩瓦解，不复存在。战时的国民政府期望与印度结盟，一边反抗欧洲的殖民列强，一边抵抗日本在亚洲的侵略。因为此种境遇下的中印已然同病相怜：若西方殖民主义继续扩张，中国将成为下一个被完全殖民化的印度；若日本军国主义继续猛进，印度将成为下一个被日本践踏的中国。然而，印度彼时领袖（甘地和尼赫鲁）的反应，并没有达到国民政府的预期，他们除了在外交辞令上表达了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爱，对中国面临困境的关切与支持并不如期望中的真切实在。这是因为，印度一方面缺乏对中国状况的真实了解，难以产生战略合作的切实愿望；另一方面，印度在走向独立摆脱殖民的道路上处境被动、自顾不暇，主观上缺乏决断力，客观上缺乏决策权，难以实现切实的战略合作。另外，印度是在200多年的时间里，一步步被英国蚕食，沦为殖民地的。发生在印度本土的内部战争和对英抗争，从地域范围和时间范畴上并没有形成大规模和长久的武装对抗局面。在世界性战争中，印度士兵是作为英国派出的军人参与战斗的。也就是说，在近现代的战争中，印度本土并没有成为主要战场，建国前夕的政治精英对战争还主要停留在策略博弈和空间距离带来的想象中，没有切身经历带来的危机感，也没有迫在眉睫的威胁带来的紧迫感，甚至还有些许包裹在英国坚船利炮等先进武器中的“安全感”。

总体而言，在民族主义的兴起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中，印度与中国的命运息息相关，虽然自顾不暇，但是印度的精英还是关注了中国的动态。尤其是1930年后，中国的抗日战争、内战等状况得到印度的更多关注，印度的记者也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记者一样，密切关注中国的动态，及时报道有关中国的状况。^①这直接体现了在反帝反殖民时期，中印两个亚洲邻国间的镜像关系、亲密关系，以及类似处境中的情感联系。

^① 参见 Tansen Sen and Brian Tsui, *Beyond Pan-Asianism: Connecting China and India, 1840s-1960s* (Ind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pp.176-177。

二、《重庆日记》：战时亲历的触动

中印作为历史悠久又比邻而居的两个文明体，在近现代的交流往来与彼此认知中，存在着诸多盲区与误区，并引发了诸多彼此心理上的隔阂和误解，诚如《西行漫记》的作者埃德加·斯诺在为柯拉卡的《重庆日记》附序时所言：“事实上，印度和缅甸的知识分子已经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对欧洲和美洲的历史（研究）中寻求类比与指导，远超过从对同时代日本、中国和苏联的历史研究中寻求指引。印度可以从这三个国家学到很多东西，但是，她似乎可能最易从中国艰难的社会变革中找到类似之处。”^①

《重庆日记》的作者柯拉卡是受过良好西方教育的印度记者、作家，他于1942年春前往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是彼时唯一在那里的印度记者。在短短一个月的派驻时间里，他马不停蹄地履行着战地记者的职责，及时记录下了他在重庆的日常经历与点滴感受，其中不乏极富洞见的敏锐思考。他的书写，为民族国家建立前期的亚洲国家、新中国成立前的战时状况，留下了宝贵的书面记录，提供了难得的观察视角。恰如当他乘坐飞机途径缅甸最终抵达重庆，来到自己工作栖身的招待所后，记录下第一印象时所说的：“这家招待所被一次次地轰炸过，目前的构造已经看不到一点当初的样子。与重庆的大多数房屋一样，这里曾不止一次被夷为平地，也像重庆其他所有房屋一样，会再次拔地而起——好似浴火重生的凤凰。这里正在打仗，从报纸上了解再多，也远不及你身处此地的感受。在这里，战争构造着你的生活，而你的看法也会依实际境况而改变，这种我们所处时代的普遍境况。”^②对时代和他处的理解，不可能从讯息中得到全面立体的实现，但是，每多一个侧面，都是走向全面的努力。这些到一线记录下来的宝贵资

① D. F. Karaka, *Chungking Diary* (Bombay: Thacker & Co., Ltd., 1944), p. 6 of the Foreword.

② Ibid., p. 22.

料，为这一实现，提供了参照的方向。

战争是人为的人类灾难。被轰炸的城市，被战争席卷的生活，是战场之外的人根本无法“感同身受”、凭借想象便妄图体会到的现实。亲历的震撼，是超越任何幻想和矫情的。柯拉卡先生在《重庆日记》中记述道：“看看这家媒体招待所，顶多是个茅草屋一间，与它相比，孟买随便一座住宅的外屋和佣人房都堪称宫殿。但是，换了个环境，远离那些生命中更加舒适的事物，给人一种伟大之感——远离那些豪华座椅和有坐垫的椅子。居住在战时的重庆，比待在印度无所事事，更加刺激。你的灵魂好像突然感到充实了。”^①1942年春，当这位曾经留学欧洲的印度青年记者，满腔热情又忐忑不安地来到重庆时，中国已经遭受了来自日本侵略者长达五年的战火洗礼，华夏大地满目疮痍。在战争中，摆在人类面前的生存问题来得了然直接：“来到这里一两天之后，我便开始认识到我们在印度含糊地称之为‘战时状态’的一些东西。我能够亲身体会到，如何通过共同生活、合作组织来拯救和帮助彼此，才是解决战争造成的那些生存问题的唯一办法。”^②

印度是派兵200多万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殖民地，柯拉卡作为来自英印帝国的有识青年，在抵达中国前，一直体会的是别样的“战时状态”：有宣传、有宵禁、有限量供应等，却没有身处真实的硝烟战场。在那里，军官晚上到夜总会喝酒跳舞，官员为战争举办慈善晚会，富人用多购票的方式为自己的交通出行提供便利；在那里，大家都知道在打仗，但这充其量只是给日常的生活带来一些限制和不便，如他在《重庆日记》中所描述和思考的：“此时此地，在世界的这个地方，战争真实地正在进行着，关系着这个国家的生死存亡。人们的所思所想、吃住行，都和战争息息相关。这与我当初在还在印度时，脑海中勾画出的重庆是多么的不同！我当然知道中国已经打了四年多的战争，可印度也已经打了将近三年了——我是这样被告知的。我们曾

① D. F. Karaka, *Chungking Diary*, p. 17.

② Ibid., p. 21.

为印度在战争中的付出感到自豪。曾经，隔三岔五地我会在印度的独立广场（*maidan*）上看到游行队伍，机灵的女孩子们身着精神的制服，英姿飒爽，那漂亮的身姿很是引人注目。我还记得英国人唱着他们的歌曲（*Roll on the Barrel*）和《黛西黛西》（*Daisy Daisy*）。我在印度时汽油用量是定量供应的，因为印度处于战争状态——我是这样被告知的——于是有时候我不得不坐公共汽车出行。自从我离开之后，我听说他们甚至建立了民族战争阵线（*National War Front*）！而且由欧洲集团（*European Group*）的副手领导！（堂堂）一个民族战争阵线，唉，将永远作为底层基地存在。我想，当我回去后我会认为，印度只是自以为自己在打仗。”^①而这种“被告知”的情形，在世界各个角落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这种生活活动空间的有限和通过讯息与他处进行比较的建构，是那么的自然而然，是那么地理性符合逻辑，但同时又是那么不可避免地走向虚构与偏激。因为这里面缺失了感性体验，也低估了感性判断在群体意识建构中的分量与发挥的作用。而这些表面上符合逻辑的理性宣传、动员与建构，在受众中更多的影响力正是源自建构过程中隐藏在其中的感性能力，比如优越感、比如同情心、比如友好或敌对情绪的激发。

柯拉卡先生在重庆工作的那一个月里，东京第一次遭受美国空军的轰炸。当消息传到重庆后，他如此记录了重庆街头的民众反应：“我不会说这样的观察评论是不真实的，我只是在说，我并没有见到我期待中的欢呼雀跃，我很高兴看到的是，即使在得知了像轰炸东京这般重要的事件后，中国人并没有从中获取任何施虐式的喜悦。轰炸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必然，但也仅限于军事需要，而非一件让人幸灾乐祸的事情。而且，因为我来自于一个人民不知轰炸为何物的国家，我的直接反应并不会是对他国遭遇的不幸感到欢欣鼓舞，即使那个国家是我们的，敌人。”^②只有真正身处战争中的人，才会用这种理性的人道

① D. F. Karaka, *Chungking Diary*, pp. 169–170.

② *Ibid.*, pp. 29–30.

主义眼光看待生命，才会超越战争作为手段的残酷性，才会抵达全人类命运相通的群体生存原貌。战争不再是他处的不幸，城市也不再是地图上的陌生名字。中国是近现代饱受战争之苦之地，这里的人民对苦难仍有感性的记忆。这对于没有生活在真正成为战场的地方的民众来说，没有亲历的经验，是无法从新闻报道和人道主义援助宣传中理解中国的。

在《重庆日记》中，这样一段文字原封不动地被引用过两次：“痛苦与苦难是战争的面貌；在这个残酷无情的时代，人心冷漠，对新近发生的恐怖事件漠不关心。但这种漠不关心的程度是由一个人与暴力发生地点的距离来衡量的。一个生活在中国的人，不可能无动于衷，不可能不将所感所想付诸行动。在你没有亲眼看见这些形容憔悴、饥寒交迫的人们拖着疲惫的身躯，走过无数尘土飞扬的小路时，中国有6,000,000名流离失所的难民这个冷酷的事实对你来说并不意味着什么；在你没有听到火焰的咆哮、炸弹的砰砰声，没有看到血肉之躯与钢铁碎片交融的恐怖后果时，日军在一天内炸死4000人的事实对你来说也毫无意义；没有看到一个失去父母的孩子充满疑问的眼睛，感受到他在寻求安慰时紧握着你的手时，对你而言，中国的10万名战争孤儿无非是一句空话。”^① 亲历战时中国的柯拉卡，清晰地描绘出隔着时空对他处事件的“冷漠静观”姿态，这不是人心的冷漠，是现实距离感造成的真实结果。在作品中另一段被多次提及的文字来自西方列强的视角：“中国距离我们是那么的遥远，我们能够给予她的，唯有同情。那里正在发生的事情真是糟透了，但是，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如你所知，强者当先（The strong get ahead）！”^② 在社会进化论盛行的时代，在科技应用开始的初期，在“人种论”被普遍接受的年代，在帝国秩序崩塌，世界新秩序形成的阶段，在傲慢空战与钢铁意志的比拼中，在资本优越与技术落后的碰撞中，用头脑评价与分析，很容易得

① D. F. Karaka, *Chungking Diary*, pp. 60–16, 99.

② Ibid., p. 78.

出孰优孰劣的结论，通过对事件的报道与描述，也不难找到道义的在场。可是，各自身处不同境遇的群体，试图去帮助理解另一个庞大的群体，仅仅是这个初衷，就足够得到肯定。但是，沟通与理解的过程，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都不是依靠努力和良好愿望便可实现的通途。由于信息不对称和自身所处环境、形成思维模式的客观局限性等因素，在尝试理解、积极沟通这一过程中，采用的方式方法仍会不可避免地受政治、经济等各种目的所主导，沟通的领域、内容也不可避免地会被主观选择。但是，无论如何，这都不应成为放弃沟通理解的努力及良好愿望的原因。由此可见，像《重庆日记》这样的作品，这样兼备专业资质和人性思考的亲历记录，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将战争范围拓展到亚洲视域中，柯拉卡先生的比对是如此这般的：“我们在印度尚未（有机会）检验我们的基本服务设施。长久以来，我们没有感受过遭受空袭的恐怖。卡基纳达（Cocanada，印度安得拉邦的一个城镇）和维沙卡帕特南（Vizagapatam，位于孟加拉湾畔的海港，印度安得拉邦的第一大城市）遭到过轰炸，但那很难被称作空袭。重庆遭受过的那种轰炸，伦敦在九月的闪电战中遭受过的那种轰炸，是那种旨在摧毁地面上一切的从空中发出的重击，都是我们未曾经受过的。……阅兵和演习很难让人信服，因为处理一具你知道是确实活着的‘尸体’（尽管被贴上了死亡的标签）是一回事，处理一具被炸毁房屋废墟压碎的尸体可就是另一回事了。”^①印度次大陆本土的战时状态有其自身的处境，虽然200多万士兵作为英帝国的军事力量投入到了中东、东南亚等地的战场，为二战做出了巨大牺牲与贡献，但值得庆幸的是，印度次大陆本土没有成为战火燃起的主要区域，社会不同阶层的民众也没有共同迎战的相互援助与扶持。印度次大陆内部纷杂交叠的社会结构和人群处境，已然决定了他们各自不同的体验与视角，面对外部世界的看法与理解，也就不可能形成一致的声音。如此的现

^① D. F. Karaka, *Chungking Diary*, pp.94-95.

实情况，在信息不对称的长久年代中，不仅建构出了权威视角与政治视角的话语体系，而且为此积累了大量素材，甚至形成了观察者的思维模式和判断惯性。由此看来，并不“著名”的《重庆日记》，是柯拉卡先生贡献出的宝贵的历史文字记录。

再将战争范围拓展到全球视域中，柯拉卡先生是如此传达信息的：“欧洲已经习惯于把中国人看作是一片由黄色面孔组成的汪洋大海。那些自称是中国问题专家的人，在中日战争开始时就预言，这场与日本机械化部队的战争持续不会超过6个月。但同样是这些衣衫褴褛、落后、机械装备简陋的中国人，在不具备充足反击方式的情况下，经受住了猛烈的侵略战争，在这片被地狱之火灼灼燃烧的大地上，天空、大地、海洋时时被火舌吞噬着，继奥地利人、捷克人、波兰人和挪威人、荷兰人……之后很久，中国才站稳了脚跟。”^①那是人类近现代史上残酷角逐的时期，是科技进步理论更新的飞跃时期，也是人类自我膨胀带来的黑暗时刻——在倡导自由平等的西方列强眼中，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大部分人群，尤其是有色人群，是不属于人类范畴的，是不配追求自由平等的。柯拉卡的文字，记录了宏观视角下彼时正在发生的最朴素也是最悲惨的事实。

三、在战略意义中构建的他者形象

作为亚洲毗邻的两个古老文明，印度和中国都拥有深厚独特的文化和庞大的人口。在近现代，滥觞于西方的工业革命、科技发展和资本主义制度，曾让两个文明体先后陷入被动挨打、发展落后的境地。经过在内外交困中百余年的挣扎、对抗与革新，中国在1911年爆发了辛亥革命，在1945年最终击败了日本侵略，在反帝反殖民的斗争中为亚洲古老国家带来了信心。尤其在彻底推翻皇权这一做法上，中国让

^① D. F. Karaka, *Chungking Diary*, p. 118.

世人瞠目结舌。这些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让喜马拉雅山另一侧的英属印度备受鼓舞，亚洲将重回世界舞台的中心似乎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在近代倍受挫折的亚洲古老文明，终于看到了黎明的曙光，可是在向光而行的旅程中，两国间的步伐与步调，却没有期望中的和谐。

究其原因，中印两个文明体在对彼此的认知与理解上，还存在着现实中的主、客观障碍，对彼此的认知主要依靠主观推想，以及基于个人经历、媒体报道的客观想象。因为，在对异域社会历史与异质文化的观察与研究中，会不可避免地通过比较去发现不同点，同时在潜意识里默认相同点。例如，在1900年前后英属印度发行的本地报刊中，彼时的印度“精英”将中国衰落的原因主要归咎于与西方的接触以及基督教带来的“毒害”。^①此类判断，从侧面反映了依据自身感受做出的主观推测和潜在的关注重心，抓不住要害重点，缺乏宏观的视野和历史的观察，无法全面深刻理解客观的历史进程。

二战结束后，摆脱了殖民统治的印度次大陆，最终以宗教归属为第一身份标识，让世界版图上第一次出现了巴基斯坦（意为“圣洁的土地”）这个伊斯兰国家。千万人次的大迁移，百万人次的伤亡，给在近现代历史上没有经历过大规模本土战争的印巴人，带来了心中最深刻的痛。国家独立了，殖民者走了，我们是“我们”了，可究竟谁才是“我们”？对印度而言，以宗教为第一标识独立的民族国家，虽然理性地用世俗国家来定义自己，来平衡国内繁复的宗教信仰自由，但是，社会动员、民众凝聚力靠什么来实现？印度从后殖民进入到独立的现代主权国家，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上，没有发生过翻天覆地的变化，沿用了脱胎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议会民主制。但是问题在于，西方的政治制度是经济动力革命的内发生成，曾经作为殖民地的印度熟悉这一体制，但并不意味着适应这一体制。这是因为，不仅印度不具备与该制度相匹配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而且印度大多数

① 参见 Tansen Sen and Brian Tsui, *Beyond Pan-Asianism: Connecting China and India, 1840s-1960s*, p.196.

群体也不具备与之相适应的思维及认知习惯。在如此前提下，在民族主义浪潮中独立的印度，在整合协调国内资源，在社会动员中调动属民的国民身份认同感时，在其政策宣传过程中，国家、政府和民众间的共同理念、认知等需要逐一建构。在此情况下，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大众传媒领域，对“假想敌”的树立与描述，在社会动员和推进国民凝聚力中，有力且奏效。于是，在顶层设计负责建构“我们是谁”的引导下，在大众民间直接抛出了“谁是我们”的判断，虽然这个判断看上去是群体中的个体主动自觉做出的。如此看来，当下的印度，外交不会太过火，但内政一定会利用中国和巴基斯坦这两个因素，以及由这两个国家间友好关系构成的第三因素。如此，也就不难理解面对大体量又“同时崛起”的中国时，印度的矛盾心理了。毕竟，在社会动员中，民众的“感性客观”超过他们的“理性客观”。理性客观与感性客观本不矛盾，但是，当一个当代社会在社会动员过程中，频频选择与他者的对立姿态来巩固社会内部的身份感，来与外部世界平衡权益时，便打破了决策中存在的感性客观和理性客观的平衡，甚至会走向偏激和无理。

具体而言，即使是在英殖民时期，印度次大陆地区也是英印帝国与王公土邦并存的政治生态，除了军事外交统一外，各地基本延续了自治的历史。因此，进入民族国家建立的时期后，虽然在地域上继承了英殖民整合时期的疆域，政体上也“承袭”了议会民主制，但是悠久的历史文化内核，却与这些新型体制模式摩擦出了各种不适应症，其中对当代“民族”的认知，就很难达成共识。在巴基斯坦以伊斯兰教立国的“分治”过程中，印度相应地被镜像为另一个以宗教为首要辨识度的民族国家。在接下来的发展中，印度教担当的社会动员功能的使命，也一再显现出来。由此，在凝聚国内精英力量，以及扩大政党影响力的社会动员中，今日的印度国家凝聚力，既可以通过与巴基斯坦的对立获得，也可以通过“中国威胁论”来巩固。近在眼前的例证是，2021年1月28日，印度外长苏杰生在出席第十三届全印中国研

究会议（the 13th All India Conference of China Studies）时提到，发展中印关系的基础是且只能是“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和共同利益”这一“相互性（mutuality）”核心。他在发言中还进一步强调，“国家间关系本质上是互惠的”。进一步追究，这“互惠”前面的“相互尊重和相互理解”，作为前提表面上很容易达成共识，但在理性认知和集体实践上，则很难实现。

与官方社会动员的目的不同，民间交流的着眼点和内容更加丰富也更具洞察力。例如，《印度教徒报》常驻北京的记者帕拉维·艾亚尔（Pallavi Aiyar）在2008年出版了《烟雾与镜像》（*Smoke and Mirrors*,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India, 2008）一书。她于21世纪初来到中国，并在北京生活了7年。结合自身的成长经历，她认为，作为普通民众，印度人对中国的了解很是有限，而且对20世纪两国边境战争的结局耿耿于怀。老一辈人习惯用老式眼光看待今日中印间的发展落差，甚至在外交策略上也依旧延续着旧的外交思维模式。在她看来，一方面，印度民间对中国的看法比较片面，也不成熟，由此导致在看待两国间的发展差距时，缺乏理性的研究与思考。另一方面，官方对中国的介绍被各类数据充斥着，用数字冷冰冰地诉说着中国的发展，对中国的国民面貌与人情，很少涉及。她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在我成长的那些年，电视上不介绍中国，学校也不教授中国历史文化知识。我们知道的关于中国的那一点儿有限的东西，偏偏都还是相当负面的：关于1962年那场边界战争。这给多数人带来对中国的一个基本印象：中印关系不好，中国是个不值得信赖的国家。……我这一代人不像父母那辈怀有这么深的负面情绪，但总体来说印度对中国的印象是不好的，这股负面情绪背后有没有多少对中国真正的了解。”^①当被问及是什么吸引她来到中国后便决定留下来的时候，她回答说：“中国用30年浓缩了其他国家一个世纪走过的发展道路。我感兴趣的是，一个国家

① 张芸撰文：《一个印度人眼中的中国》，“书与作者”访谈。参见：<https://www.ixueshu.com/document/a0d7bb67273064f37f142fec42f536d8318947a18e7f9386.html>。

在如此迅疾的变化发展历程里是怎么保持自己的身份认同的。我接触到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想着他们目睹了这个国家多么巨大的转折变化，这是惊人的！我想知道这一切新的新的新的……层出不穷的新的事物给这个国家带来了哪些心理层面的变化。”她尤其针对当代人，提出了“中国感（Chineseness）”^①这一思考点。“让我感兴趣的是：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中国人有一股很强的‘中国感’。但如今你怎么定义这个‘中国感’呢，你祖父辈到你到今天出生的孩子们，这个中国特性已经一代不同于一代，但这股与生俱来的‘中国感’一直延续在一代代中国人身上，这种表面上疯狂地建造新事物，疯狂的堆砌发展之下得以延续的一股‘中国感，中国气息，中国文化’使我对这个国家非常痴迷，她是怎么把某些变和某些不变融合到一起的？另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充满了矛盾冲突的地方，这一点上和印度相似。比如年轻一代的人们见多识广，他们也是利用互联网很多的一批人群，但另一方面他们不知道这个国家过去真正经历了什么，在某些领域他们没有获得信息的渠道。这种有见识（worldly）和懵懂无知（innocence）在年轻一代的中国人身上都得以体现。类似这样冲撞、碰撞的情形在中国很显见。……是在语言和食物中体会到了这种‘中国感’。政治上的统一联结也是‘中国感’的一个来源。”^②艾亚尔透过目之所及，伸手可触的物质变化，得到了她自己思考出的答案，从语言也好，食物也罢，甚至政治上的统一联结出发，在经历7年的切身体验与思考后，她才开始认识甚至理解中国了。例如，当她举例说明中印之间的不同时，她谈道：“我了解中国也有过大的贫富差距，但就劳动的尊严感来说，这里普通的尤其是下层的劳动人民比同一层次的印度人收到多得多的尊敬。我在书里有一章也专门提到这点。我想是因为中国的封建残余多少被清除了，创造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平等。而印度在社会建构上仍带有强

① 张芸撰文：《一个印度人眼中的中国》，“书与作者”访谈。参见：<https://www.ixueshu.com/document/a0d7bb67273064f37f142fec42f536d8318947a18e7f9386.html>。

② 同上。

大的封建气质。印度社会的变化是十分缓慢的循序渐进，中国社会是跨越式变化，印度妇女也会工作，但工作中‘男女有别’的差异在中国更小。我还是把这一分别归结于中国的革命，革命带来了这样彻底的变化，带来了一些平等。”^①具有这样宏观的历史视角和朴素的理性思考，也许与她曾在伦敦进修东方学、专攻中国学的外交官先生不无干系。

由此可见，对中印彼此而言，无论是旧式思维的延续，还是自以为科学的推理，都有可能将我们带入远离真相的设定目标里。在如此“险境”可能存在的前提下，多一些善意的引导和良好的沟通愿望，对双方而言，都应该是利大于弊的。

结 语

最后，粗略回顾近百年来的中印关系，可大致体现为温—热—冷—回温的历程。从20世纪初起，从反帝反殖时期延续到民族国家成立的阶段，两国同病相怜，关爱相望，虽没有太多实质性的往来，但友好关系人尽皆知。伴随着两国的先后独立，国家关系发展由“温”升到“热”，两国成了“兄弟”。但是，由于文化历史内核的差异和独立后制度的不同，两国仍欠缺对彼此的深入了解和交流往来。而不久之后，1962年在中印边境爆发的武装冲突，重创了这一尚未牢固的关系，导致两国关系一冷就是14年。直到1976年，两国之间没有过一笔直接贸易产生，两国关系跌到冰点。1976年后，两国领导人开始互动，开启了两国关系的破冰之旅。从1981年到1987年，中印双方就边界问题进行了八轮谈判，进入到双边关系恢复期。1988年12月，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访华，自此，中印关系逐渐走向正常化，中印关系终于开始回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存在着的诸多问题会随之化解。就两

^① 张芸撰文：《一个印度人眼中的中国》，“书与作者”访谈。参见：<https://www.ixueshu.com/document/a0d7bb67273064f37f142fec42f536d8318947a18e7f9386.html>。

国彼此间的了解而言，从官方、媒体，到工商经贸，再到民众，了解程度逐次递减。进入21世纪后，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成果的收获，同样作为世界人口大国、同属亚洲古老文明的印度，更多关注两国发展中的差异，对两国进行了更多比较，但是，深入的了解与理性的声音，还远远不够。至此，中印两国在百年来的历史进程中，在各自的发展成长过程中，除去亲历其境后留下的凤毛麟角的一线记录，对彼此的了解更多地停留在官方的战略构建中和媒体的目的性塑造中，而其中的中国形象，对印度这位老朋友而言，其轮廓的清晰度，要远远大于内涵的深刻与广博。